



GESIER
YAN JIU

《格斯尔》
研究

巴雅尔图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GESIER
YAN JIU

《格斯尔》 研究

巴雅尔图 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斯尔》研究/巴雅尔图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11-6710-7

I. 格... II. 巴... III. 蒙古族—长篇小说—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9242 号

《格斯尔》研究

巴雅尔图 著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90 千

版本/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 1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维力斯大厦 9 层

电话/(0471)6608179 6608165 邮编/010010

网址/http://www.im-eph.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311-6710-7/G·6200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系调换。

◎ 内容提要

本书运用文献学和版本学研究方法,从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的历史、版本和抄本特征、文学形式、文化艺术风格、源流考辨以及她在蒙古族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蒙古文学传统的关系等方面,对1716年北京版《格斯尔》和诺木齐哈屯本《格斯尔》、鄂尔多斯本《格斯尔》、隆福寺本《格斯尔》以及蒙文《岭·格斯尔传》等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北京版《格斯尔》是蒙古族古典书面文学中最可靠的版本。她是蒙古人为了激发成吉思汗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对古老的格斯尔神话、传说、史诗进行整理、改编,并在再创作的基础上形成的长篇神话小说。塑造了格斯尔、茹格穆·高娃、阿珠·莫日根、哲萨·希和尔、伯通·巴特尔等众多神话人物形象,艺术地反映了蒙古族古老的神话世界的情景,深刻地揭露了明清时期社会的丑恶现象,辛辣地讽刺了喇嘛教及其上层人物,在宗教信仰上主要体现了萨满教的思想。

并指出在故事题材、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思想内容和众多艺术形象上受到了《西游记》、《三国志演义》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影响。同时,还对国内外《格萨(斯)尔》研究中“历史学派”主张的“格萨尔是藏族历史人物”等观点提出了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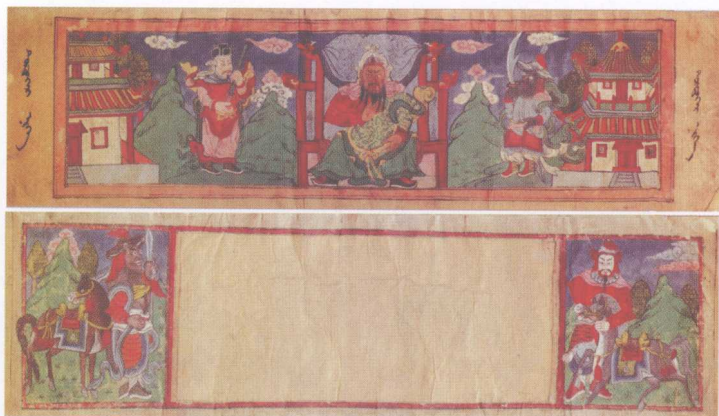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巴雅尔图，男，蒙古族，博士，副研究员。1948年9月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衙门庙村。当过兵团战士、小学教师和翻译。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蒙古族《格斯尔》和蒙古文《西游记》研究。主要著作有：《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北京版〈格斯尔〉研究》（蒙古文）、《蒙古图吉（小说）类型及其发展演变》（斯拉夫蒙古文）、《蒙古文〈西游记〉研究》（汉文，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待出版），另外有40余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相关刊物上发表。现承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重点课题研究任务——《蒙古文〈三国志演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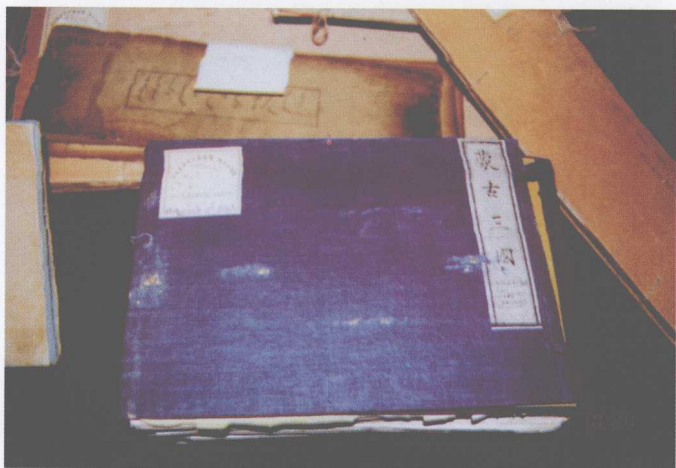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作者与著名《格斯尔》
说唱艺人金巴扎木苏合影



鄂尔多斯本《格斯尔》
扉页及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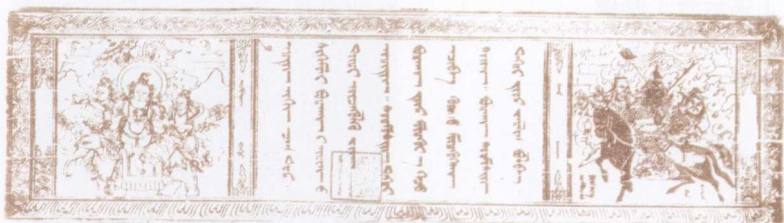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
馆收藏的蒙古文《格斯尔》抄本

蒙古地区流传的关老爷
(关云长) 画像



青海塔尔寺金瓦殿上的
格萨(斯)尔画像



北京版《格斯尔》扉页



北京版《格斯尔》封底

前言

长期以来,一提起蒙古族《格斯尔》,人们总是习惯地只称她为英雄史诗,而忽略她的文学形式。至于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的互相关系,虽然多数学者持以“蒙古族《格斯尔》和藏族《格萨尔》是同源异流作品”的观点,但是在诠释其“源”与“流”方面,却一直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一种值得质疑的说法,已被媒介广泛采纳,即只认为“我国有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可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哈婆罗多》相媲美”。这样,蒙古族《格斯尔》实际上无端地被排斥在“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之外。

笔者从事过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对上述观点存在疑问,而主张从版本学研究和文学形式辨析角度重新审视国内外《格萨尔》和《格斯尔》(以下通称《格萨(斯)尔》)研究的历史,既吸取先贤们的宝贵经验,又针对《格萨(斯)尔》研究的薄弱环节,选择新的突破点,进一步探寻《格萨(斯)尔》形成和发展的奥秘。但是,由于本人不懂藏语,不能在藏族《格萨尔》研究方面有所贡献,深感遗憾。这里仅以蒙古族《格斯尔》为主题,作一些比较研究,略述己见,希望能抛砖引玉,为蒙古族《格斯尔》研究事业的昌盛而唱一曲赞歌。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格萨(斯)尔》研究界在版本、文献学研究方面所投入的力量尚显不足,也就是说《格萨(斯)尔》比较研究的基础工程还没有全面展开。相比之下,专门研究蒙古族《格斯尔》的学者数量显得偏少,不能从根本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格斯尔》庐山真面目。因此,笔者试出版这部拙著,回顾国内外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历史,重点论述蒙古族书面《格斯尔》的文学形式、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她在蒙古古代文学、蒙藏民族文学关系和蒙汉民族文学关系发展史上的积极贡献。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 不能把蒙古族《格斯尔》简单地称为英雄史诗,因为蒙古族《格斯尔》中不仅包括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传统意义上的格斯尔英雄史诗以及一系列格斯尔神话和传说,而且更重要的是,《格斯尔》中还包含了蒙古族古典书面文学精华——格斯尔长篇神话小说。

不严格区别“格斯尔神话”、“格斯尔传说”、“格斯尔史诗”和“格斯尔长篇神话小说”,而笼统地说《格斯尔》是“英雄史诗”,实际上混淆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界限,忽略了蒙古族《格斯尔》原本就以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并行发展的流变特征,低估了蒙古族书面《格斯尔》的文学价值。

2. 蒙古族书面《格斯尔》的光辉代表之一,是《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Arban жүг-үн ejen Geser qayan-u tuyuji oruşıba, 1716年北京木刻版,以下简称“北京版《格斯尔》”)。关于她的古典书面文学性质,18世纪初的蒙古族学者们认识得相当深刻。当时的编辑或出版者根据这部文学作品的形式和思想内容,毫不含糊地称之为“图吉”(Tuyuji,即小说)了。所以天才的策·达姆丁苏荣院士将《蒙古秘史》、《格斯尔》和《江格尔》誉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高峰”,形象地说明了蒙古族《格斯尔》的古老性和她在蒙古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布里亚特《阿拜·格斯尔》、巴林《格斯尔》和乌兰察布《格斯

尔》，是蒙古族传统的长篇《格斯尔》英雄史诗。无论就其优美的韵文体形式而言，还是根据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来评价，她们都不亚于著名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和《摩哈婆罗多》。因而，怎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蒙古族《格斯尔》史诗的内涵，更科学地评价她的文学本质以及她在史诗领域里所占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是当前《格萨(斯)尔》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倘若忽视了对蒙古族《格斯尔》史诗的研究和科学的宣传，那么，事实上就是扭曲了她的民族性和她作为古老民族英雄史诗而世代流传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换言之，认为“蒙古族《格斯尔》英雄史诗不是与藏族《格萨尔》并驾齐驱的大型英雄史诗”的观点，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格萨(斯)尔》爱好者或研究者，对蒙古族《格斯尔》史诗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而跨越出史诗研究的传统框框，从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史，特别是从蒙古族古代书面文学体裁发展、演变的广阔角度来探究蒙古族《格斯尔》史诗和蒙古族《格斯尔》神话小说的传承关系，无疑是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的重要突破点。这正是笔者着重研究蒙古族书面《格斯尔》，认为北京版《格斯尔》是长篇神话小说的根本缘由。

关于“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同源异流”说，尤其是“蒙古族《格斯尔》源于藏族《格萨尔》”的传统观点，长期地左右过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界。但是，比较研究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的历史表明，似乎成为定论的这一传统观点，依然缺乏文献学方面的实证。

回顾《格萨(斯)尔》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确实为前贤们的不断探索和已经获得的累累硕果而欢欣鼓舞。在国外，策·达姆丁苏荣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R·A·石泰安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W·海希西的《〈格斯尔〉研究》、P·M·霍姆诺夫的《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埃黑里特——宝力嘎特版本)》

等著作相继出版,使国际《格萨(斯)尔》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著名学者的著作,论证详备,观点新颖,开拓性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研究经验和丰富的研究资料。然而,国外《格萨(斯)尔》研究专家们关于《格萨(斯)尔》起源以及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互相关系问题的论述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和弊端。还有的学者似乎在研究《格萨(斯)尔》的实践中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打了退堂鼓。

中国是《格萨(斯)尔》的故乡,蒙、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孕育了《格萨(斯)尔》,使之发展成为以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世代流传的跨民族和国界的英雄史诗和长篇神话小说。更值得我们自豪的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抢救、收集整理和研究《格萨(斯)尔》的工作被纳入国家最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之内,得到了中央和相关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扶持。1989年以来,我国成功地组织召开5次“《格萨(斯)尔》国际研讨会”,促进了《格萨(斯)尔》研究的国际合作。1991年11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格萨(斯)尔》说唱家命名大会”,进一步发动了《格萨(斯)尔》抢救大战。

随着《格萨(斯)尔》研究伟大事业的复兴和空前发展,我国《格萨(斯)尔》研究队伍很快壮大起来,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多民族的研究梯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上千篇研究论文发表,数十部研究著作出版。学者降边嘉措的《格萨尔论》、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赵秉理的《格学散论》、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徐国琼的《〈格萨尔〉考察纪实》、却日勒扎布的《蒙古〈格斯尔〉研究》、新巴雅尔的《蒙古格斯尔》探究、哈顺图雅的《蒙古“格斯尔”文化缘溯性研究》、玛·乌尼乌兰编著的《卫拉特〈格斯尔〉研究》和《〈格斯尔传〉西蒙古变异本研究》(蒙古文)、乌·斯·乌力吉的《藏蒙〈格萨尔〉的关系》、角巴东主、恰嘎·旦正的《〈格萨尔〉新探》、索代的《藏文〈格萨尔王传〉论略》、吴伟的《〈格萨尔〉的人物研究》、扎西东珠与王兴先合作

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巴雅尔图的《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北京版〈格斯尔〉研究》、赵秉理主编的《〈格萨尔〉集成》(1—5卷)、斯钦孟和主编的《〈格斯尔〉全书》(1—3卷)、斯钦孟和与巴图主编的《〈格斯尔〉全书》(第4卷)、甘肃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西北民族学院《格萨尔》研究所合编的《〈格萨尔〉文库》(1—3卷)等专著和学术资料集成,全面反映了我国《格萨(斯)尔》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研读这些著作,受益匪浅。遗憾的是,现在专门从事《格萨(斯)尔》版本学研究的学者数量太少,在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的互相关系研究方面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格萨尔》与《格斯尔》之“源”到底在哪里?“异流”(或称“分流”)究竟指什么?这是《格萨(斯)尔》研究界密切关注的课题。有些学者既把藏族《格萨尔》看做是《格萨尔》和《格斯尔》之“源”,又将这个“源”解释为与蒙古族《格斯尔》相对应的“分流”或“异流”,而有些学者针对《格萨尔》的产生时代问题,进一步提出“格萨尔是藏族历史人物”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更为热烈的争论。相对而言,关于《格萨尔》与《格斯尔》的版本、抄本的比较研究没有多大突破,以至目前人们尚未明确《格萨尔》或《格斯尔》的200多部抄本和版本中到底哪几部是最早形成的?是属于哪一年代的作品?

迄今为止,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个藏族居住的省区搜集到《格萨尔》手抄本和木刻本多达100部,加上各种异文约有200多部,说明藏族《格萨尔》史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蒙古族《格斯尔》史诗和长篇神话小说,但现在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表明前者产生的时间要比后者早。比1716年北京版《格斯尔》更早形成的《格萨尔》手抄本或木刻本有多少?是哪些作品?来源如何?一直没有正面报道。

不言而喻,蒙古族《格斯尔》史诗由口头文学作品向书面文学作品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从1240年左右成书的

《蒙古秘史》、17 世纪问世的《蒙古黄金史纲》(佚名)、罗布桑丹津的《蒙古黄金史》和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等蒙古编年史著作的创作风格和语言特征上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黄金时代属于 13 世纪以前,而不是在 17 或 18 世纪。笔者认为,13 世纪以后,蒙古族英雄史诗并没有停留在自身发展的高峰阶段,而是随着民族历史文化的迅速发展,蒙古族经典史诗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深刻变异,并逐渐显现出了推动书面文学发展的特征。另外,由于蒙、藏民族文学和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深入发展,蒙古族古典书面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也有了质的演变。因此,像北京版《格斯尔》这样不朽的长篇神话小说应运而生,生动地反映了蒙古族古典文学由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作品发展的阶段飞跃到历史小说及神话小说脱颖而出的继承与演变过程。而对蒙古族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出现的这一显著变化,学术界重视不够。以往出版的蒙古文学史著作都没有把蒙古族古典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来研究。这无疑是蒙古族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研究课题,难怪蒙古族古典文学研究界很多老前辈都尽量回避之。

在蒙古族《格斯尔》研究中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从历史资料的考证转变到蒙古族《格斯尔》版本学研究上来,并从古典小说研究角度重新审视书面的蒙古族《格斯尔》,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蒙古族《格斯尔》研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其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S·A·科津院士的学术观点便引起了很多《格斯尔》研究者的关注。他首先肯定了北京版《格斯尔》的书面文学性质,对其作者或编辑出版者的意图予以重视,并强调了这部作品不同于蒙古族其他史诗作品的显著特征是以散文形式写成的。他还深入研究北京版《格斯尔》描述的社会生活,敏锐地发现了这部作品的讽喻风格和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从而充分肯定了她区别于其他传统蒙古英雄史诗的独特性。

正如有些学者不懂藏文而借助汉译文来研究《格萨尔》，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那样，不懂蒙古文而借助汉译文来研究蒙古口头《格斯尔》或书面《格斯尔》，甚至力不从心地去从事《格萨(斯)尔》的比较研究，是不值得提倡的事。有的学者认为北京版《格斯尔》是来源于藏文《格萨尔》，她不是独立创作的，而是以藏文《格萨尔》为依据的。笔者相信北京版《格斯尔》不是蒙古族传统的英雄史诗文本，也不是佛教文学作品，更不是藏文说唱体《格萨尔》的翻译作品，而是地道的蒙古文长篇神话小说。她虽然是18世纪初出版的作品，但是从语言特征上看，不是用16世纪至18世纪初期的蒙古语言写成的。也就是说，她的语言既不同于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各种佛经或佛教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不像是当时未曾出版的若干部蒙古编年史著作所运用的蒙古书面语言，而是与13世纪的《蒙古秘史》语言相近的中世纪蒙古语言。因此，从版本学研究角度深入探讨北京版《格斯尔》的语言特征，应该是蒙文《格斯尔》研究的又一个突破点。

2001年10月5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一致通过将《格萨(斯)尔》列入2002~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举办史诗《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这一决定充分说明我国《格萨(斯)尔》研究事业空前发展，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高度评价。目前，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与鼎力资助下，我们广大《格萨(斯)尔》爱好者和研究人员正在满怀胜利的喜悦，隆重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全面展示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抢救和研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格萨(斯)尔》的大会战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弘扬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

展望《格萨(斯)尔》研究事业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作为《格萨(斯)尔》研究战线上的无名小卒，笔者为自己能有幸乘大船，借东风，在《格萨(斯)尔》艺术海洋里航行而欢欣鼓舞。但愿此拙